

# 战时情报局与美国对华政策(1942—1945)\*

贾钦涵

**内容提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总统为了加强美国政府对战时舆论的控制,于1942年6月成立战时情报局,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法西斯宣传、对敌心理战和情报搜集工作。到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解散该机构,战时情报局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对中国抗战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为弘扬中国人民抗战精神、提振抗日军民战斗意志、巩固同盟国家战时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战时情报局对中国抗战的宣传方针,尤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的态度,直接反映了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揭示了美国远东外交战略的实质。

**关键词** 战时情报局 抗日战争 战时宣传 美国对华政策

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总统罗斯福鉴于形势需要,请他的亲信、著名作家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秘密筹组一个新型的情报机构,致力于将无线电广播作为一种现代化心理战武器进行发展。<sup>①</sup>美国对轴心国宣战后,罗斯福总统于1942年6月13日颁布行政命令正式设立战时情报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简称“OWI”),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进行反法西斯宣传、对敌心理战和情报搜集工作。直至1945年8月31日杜鲁门总统正式宣布废除该机构,美国战时情报局存在了三年多的时间,为同盟国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此期间,战时情报局及其在华分支机构针对远东战场进行了积极而广泛的宣传活动,使中国战区及时接收了大量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信息,并且也让全世界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战场的情况。此外,战时情报局还在国统区和中共敌后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情报搜集工作和对敌心理战。

美国战时情报局是抗日战争史、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组织机构,对于该机构的基本情况及其与中国抗战的关系,长期以来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较为有限。1966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罗伯特·毕夏普(Robert Bishop)利用当时美国政府解密的档案资料,在其博士论文《战时情报局的海外机构》第五章中初步描述了战时情报局在中国的机构设置和职能作用。<sup>②</sup>日本学者山极晃在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国际视野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13@ZH028)的阶段性成果。

① “Memorandum to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 (COI) director William Donovan from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 Overseas Branch Director Robert Sherwood” (October 20, 1941),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No. 294219.

② Robert Bishop, *The Overseas Branch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66.

2005年出版的专著《美国战时情报局的延安报告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中,详细梳理了战时情报局成员随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进行考察、借鉴中共经验合作开展对敌心理战的史实。<sup>①</sup>山本武利、高杉忠明在2006年编译出版的《延安报告:美国战时情报局的对日军事工作》,系统翻译了1944年9月至1945年5月间战时情报局获取的71份延安情报资料。<sup>②</sup>此外,在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偶有论及美国战时情报局与中国抗战问题的成果。<sup>③</sup>

近年,美国学者蒋迈(Matthew D. Johnson)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比较完整的战时情报局档案,围绕心理战、大众传媒等主题,就该机构在华信息传播、同盟国家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挖掘和研究。<sup>④</sup>王睿恒在2014年提交的博士论文《塑造中国人的思想: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研究》中,从“国家形象建构”的角度切入,探讨了战时情报局(该译作“战争信息署”)在华宣传活动的开展、对中美两国形象的塑造,以及中国方面的因应。王睿恒认为该机构“基本上实现了鼓舞中国人士气和促进合作的战争目标”,但是“实现推进中国民主化改革和培育中国大国责任意识”的长远政治目标却未能达到。<sup>⑤</sup>

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关于战时情报局与中国抗战的一些基本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考察。比如,该机构针对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曾下达过哪些宣传指令?它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持有怎样的态度?美国政府的远东战略与该机构的宣传策略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对于这些问题,以往研究并未予以深入探讨。本文在综合利用多种已刊文件和未刊档案的基础上,试从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入手,对上述问题予以解答。

值得注意的是,战时情报局驻华办事处在抗战期间曾以“美国新闻处”名义进行活动<sup>⑥</sup>,但“美国新闻处”只应视为该局在华部门的权宜译名,并不适于作为整个机构的中文名称。概括而言,OWI应翻译为“战时情报局”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战时情报局”是抗战时期就已出现的译名,曾在中文报刊上广泛采用。在战时国统区发行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东方杂志》《文汇报》,延安发行的《解放日报》,以及沦陷区发行的《申报》等报刊中,该机构的名称常被译作“战时情报局”。<sup>⑦</sup>似应尊重抗战时期各类文献中既有

① 山本武利「米戦時情報局の延安報告と日本人民解放連盟」、大月書店、2005年。

② 山本武利編訳、高杉忠明訳「延安リポート——アメリカ力戦時情報局の対日軍事工作」、岩波書店、2006年。

③ Allan M. Winkler, *Politics of Propaganda: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1942-19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土屋礼子著,刘凤健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宣传传单研究概述》,《军事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土屋礼子「対日宣伝ピラが語る太平洋戦争」、吉川弘文館、2011年;一ノ瀬俊也著,刘凤健译:《飘扬在战场上的传单:用传单重读太平洋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石玮:《舒宗侨与〈联合画报〉》,《中国传媒大学第三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董小川、辛兆义:《美国文化处的历史变迁与评价》,《历史教学》2013年第2期。

④ Matthew D. Johnson, “Propaganda and Sovereignty in Wartime China: Morale Operations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under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5, No. 2 (2011), pp. 303-344.

⑤ 王睿恒:《塑造中国人的思想: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4年;王睿恒:《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的对华宣传:起源、政策与机制》,《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

⑥ 美国战时情报局驻华机构总负责人麦克拉克·费舍尔(F. McCracken Fisher)认为,一旦将该局名称翻译为“战时情报处[局]”,将会使中国方面误以为本机构从事的是“秘密情报”工作,容易招致不必要的猜忌和防备。“F. McCracken Fisher's Letter to Mr. George E. Taylor” (March 5, 1945), NARA, RG 208 Entry 6I, Box 1. “NARA”系美国国家档案馆英文全称缩写, RG208是该馆所藏战时情报局档案分类号,下文不再说明。

⑦ 《九一八以来美政府对日政策——美战时情报局公报》,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9月18日,第2版;《美战时情报局长台维斯首次广播战况》,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3月15日,第3版;《美战时情报局发表一年来国内情况》,重庆《中央日报》,1942年12月7日,第3版;《美战时情报局发表每周战况》,重庆《中央日报》,1943年3月15日,第3版;汤德明:《美国生产诸要素》,重庆《东方杂志》第40卷第9期,1944年;《罗斯福令设战时情报局》,《申报》,1942年6月15日,第2版;《英美宣传谋略的真相》,《申报》,1943年4月21日,第3版。

的、出现频率较高的译名,不必为了迎合当代汉语的使用习惯而新创译名。

(二)该机构的职能并不局限于“新闻”领域,同时兼具搜集军政机密消息、主持国外间谍活动的功能,是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同时成立的(1942年6月13日)战时情报工作机关。罗斯福总统在1943年3月9日下达第9312号行政命令规定,美国战略情报局负责使用谍报、假情报等信息对敌国实施干扰,而美国战时情报局则负责使用公开的、出处明确且有事实根据的情报信息实施宣传战。<sup>①</sup>有学者提出“情报”一词带有一定的“负面色彩”,不宜在该机构译名中使用。显然,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战时情报局自身的属性及其固有的职能。

(三)1945年8月战时情报局撤销后,原机构改组为国务院“临时国际信息服务局”(Interim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并于次年1月1日改称为“国际新闻与文化事务局”(Office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Affairs),其驻外宣传站统称为“美国新闻处”(American Information Service)。<sup>②</sup>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将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宣传部门重新整合为美国新闻署(U. S. Information Agency),直至1999年撤销。不难看出,战时情报局、新闻处、新闻署是美国行政体系中三个成立时间、行政级别、职权作用完全不同的机构组织。因此,不宜将OWI译为“美国新闻处”、“战时新闻署”等名称,否则极易与战后成立的其他美国政府机构相互混淆、产生歧义。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将“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翻译为“战时情报局”。

## 一、美国战时情报局及其中国分支机构

1942年6月13日,罗斯福总统下达第9182号行政命令,将资料统计局(Office of Facts and Figures)、政府公报局(Office of Government Reports)、紧急国防调整局情报处(Information Division of the Office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情报协调局海外情报处(Foreign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四个机构和部门统一合并为美国战时情报局。总统特别顾问塞缪尔·罗森曼(Samuel I. Rosenman)认为,罗斯福成立这样一个协调、高效的战时情报机构,目的在于确保“美国民众准确获悉战争进展和政府的战时政策;对轴心国在各同盟国家进行策反、制造联合国家分裂的宣传进行反制;向海外国家提供有关美国发展的准确报道,使其确信联合国家抱有取得胜利与和平的、坚定而一致的目标”。因此,战时情报局被授予以下职权:规划实施情报工作,针对海内外战争情况、战时政策、政府活动及目标,促进对相关情况的全面、深入理解和把握;协调所有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战时情报工作;制订关于战时情报工作的指示和命令,约束相关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按规定确立和划分情报信息的种类和等级,规定哪些信息在扩散传播前须经战时情报局审核批准。<sup>③</sup>依据行政命令,战时情报局内的最高权力机构为战时情报政策委员会,由该局局长任主席,美国国务卿、战争部部长、海军部部长,以及心理战联合委员会、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等方面的代表共同出席会议,联合制订有关战时情报的各项基本政策与任务计划。战时情报政策委员会是

<sup>①</sup> 《战时情报局国外情报任务的规定——行政命令9312号》,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著,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15—416页。

<sup>②</sup> 翟韬:《战后初期美国新闻处在华宣传活动研究》,《史学集刊》2013年第2期,第118—119页。

<sup>③</sup> “The President Establishes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Executive Order No. 9182” (June 13, 1942),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1942 Volum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42), pp. 274—283.

维系该局日常运转的核心部门。<sup>①</sup>

1942年6月18日,罗斯福任命美国新闻社华盛顿支局负责人艾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为局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Dwight D. Eisenhower)的弟弟、战时迁移局(War Relocation Authority)局长米尔顿·艾森豪威尔(Milton S. Eisenhower)出任副局长。战时情报局主要分“海外行动处”和“本土行动处”,分别由罗伯特·舍伍德和《展望》杂志(Look Magazine)总裁加纳德·考尔斯(Gardner M. Cowles Jr.)担任处长之职。

海外行动处下设“海外计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分别负责该处各项工作的规划和落实,两个委员会均由海外行动处处长统筹管理。为了便于协调欧亚两个战场的工作,海外行动处专门划分了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战区。其中,担任太平洋战区主任的是亚洲问题专家、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戴德华(George E. Taylor)为副主任。由于拉铁摩尔通常在战时情报局驻旧金山办公室执行任务,他在华盛顿的主任办公室事务实际上由戴德华负责。此外,日本问题专家布拉德·史密斯(Bradford Smith)负责在太平洋战区的政策规划事宜,阿兰·默里(Alan Murray)负责管理日常事务。该战区主要人员还包括研究中国、日本、苏联等国政策的专家,其中负责中国问题研究的是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于1943年底从中国返美后,经戴德华介绍进入战时情报局,开始参与太平洋战区的情报分析和政策制订工作。<sup>②</sup>

1942年初,美国合众通讯社重庆站主管麦克拉克·费舍尔就已经开始与中国方面的官员进行沟通,谋求开展宣传领域的合作。<sup>③</sup>1942年12月,费舍尔在重庆组建美国战时情报局在华总部机构,之后陆续在昆明、桂林、南平、永安、成都等地设立站点,并于1945年在西安、贵阳开设了办事处。<sup>④</sup>抗战结束时,驻华机构共有125名美籍人员,中国员工则多达706人。<sup>⑤</sup>战时情报局海外行动处驻华机构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主要按本局指示行事,尤其在对华宣传内容方面要遵从海外行动处的相关指令。战时情报局驻华机构主要起到新闻消息“中继传递”的作用,起初是向“中央通讯社”提供新闻资料,1942年底开始将新闻报道翻译成中文,以每周两次的频率向450家国内报纸发送关于反法西斯战争的素材。通常情况下,战时情报局使用无线电短波,从位于旧金山的太平洋战区总部向亚太地区每周播送130个小时广播,费舍尔等人则在重庆、成都、昆明设立4个主要的无线电台,在国统区其他城市共设14个分站台,使用无线电中波转播各类节目。此外,战时情报局驻华机构还为当地中国民众播放电影、提供阅览室服务。<sup>⑥</sup>

战时情报局驻华机构所发送的文字信息中,大概仅有1/10能够被中国各地新闻媒体接收到,尽管如此,每月仍有约200篇文章被翻译刊登在国统区各类报纸上。在比较特殊的时期,战时情报

<sup>①</sup>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4-003-0614. “Summary of Office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 coordinator Nelson Rockefeller’s Proposal” (May 13, 1942), Department of State,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No. 311854.

<sup>②</sup> “Memorandum: Guide to Oversea Branch” (October 6,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4-004-0679, pp. 5-11.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

<sup>③</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253页。

<sup>④</sup> 1942年12月4日战时情报局副局长艾森豪威尔致函预算局局长史密斯(Harold Smith),申请批准拨付7.5万美金用于重建该局驻重庆办事处,并称原先的建筑毁于大火。据此也可以佐证,费舍尔正式组建总部机构前,就已在重庆设立了驻华办公点。“Fiscal Issues, Information Control and Propaganda Files”,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4-002-0365, p. 181.

<sup>⑤</sup> 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96页。

<sup>⑥</sup> Robert Bishop, *The Overseas Branch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p. 277-307.

局所发布信息的转载率会高于平时。比如1943年11月初,确立中国四强地位的四国外长《莫斯科宣言》刚刚发表,而蒋介石又即将与罗斯福、丘吉尔共同出席开罗会议,仅在当月上半月(即11月1日—10日),在92种共计232份中文报纸上,战时情报局提供的文章有多达281篇被刊载发表。在海外行动处的努力下,每周约有150张底片(150个主题)、600张印刷件(150个主题)、720张塑胶展板(120个主题)被运往中国,这些图片大多被发往中央通讯社和《联合画报》社。1943年1月,战时情报局在组织上和经济上接管《联合画报》后,该刊在国统区乃至沦陷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每期发行量最高时达到5万册。与此同时,宣传影片的放映也受到广泛欢迎。在1943年前10个月,仅重庆一地就有多达758088人次观看了战时情报局放映的电影。<sup>①</sup>另外,战时情报局向中国传递信息的速度和效率也是值得称道的。比如1945年5月8日,在德国政府已预签、但尚未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时,战时情报局已在昆明的公共场所张贴出了“欧战结束、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大幅宣传画,并高调宣传“盟军将全部东移对日作战”,招引大批市民前来围观。<sup>②</sup>总体而言,战时情报局对华宣传工作的力度很大,影响力十分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准备宣传战的材料、向总部提供政策建议,战时情报局也开展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情报搜集工作,带有很强的机构特色。按照罗斯福总统第9182号行政命令,原情报协调局的海外情报处的外勤站点、出版机构等均划归战时情报局。根据1942年4月的报告,战时情报局组建之初,在亚太地区共有44名对华情报人员。其中在中国的29人中有13名专业情报员,绝大部分是美国各大新闻机构驻华人员,另外16名兼职情报员的身份包括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等。另有15人分别在中国周边的国家地区搜集和传送情报,其中印度10名、缅甸1名、澳大利亚1名,另有1名工作地点不固定。此外,根据时任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文官费慰梅(Wilma Fairbank)的统计,在美国本土共有120个服务站提供关于中国的情报,包括9家中文报纸、28家通讯社、3家无线电公司、16家英文报纸、54种期刊(包括涉华机构出版物)、6种新闻电影特别节目、4家摄影服务站。<sup>③</sup>

通常情况下,战时情报局在华机构人员获取相关情报的渠道主要包括:1. 报刊资料、新闻广播翻译,2. 观察游历和采访调查,3. 美国驻华大使馆等其他机构提供的信息。而该局关注的情报内容往往集中在社会舆论、党派主张、基层民意、日军在华活动等方面。<sup>④</sup>正如费舍尔所言:“对于中国政府当局来说,我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就不是侦察我们的盟友、把有关他们的情报发给华盛顿;我们在国统区唯一正当的情报工作是汇报民意、报告与本局驻华新闻情报机构直接相关的事务。”<sup>⑤</sup>无论是从情报获取手段、还是搜集情报内容来讲,都不难看出战时情报局在中国所开展的情报工作有别于那些具有潜伏隐秘性质的谍报活动。

总的来说,战时情报局是二战期间中国与外部世界互通信息的重要管道。比如,《新华日报》等中共媒体通常会采用战时情报局的新闻译稿来及时获取海外资讯,而并不使用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央社所发布的信息。<sup>⑥</sup>由于国民党宣传机构对国统区新闻报道实施严格的审查制度,许多消息内容往往会遭到过滤、篡改,而战时情报局的新闻消息始终坚持“真实准确”的报道原则,并能最大

① 舒宗侨:《〈联合画报〉对新闻照片的运用(1942—1949年)》,《1983全国新闻摄影理论年会论文集》,1983年10月。“China”(August 22, 1944), NARA, RG 208 Entry 61, Box 1.

② Joseph Passantino, *Signal Corps Photo CT-45-23917*, NARA, KZF-10255/10258.

③ “Public Channels for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8.

④ “Liaison betwee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other Agencies Concerning Culture Relations with China” (July 15, 194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p. 719.

⑤ “F. McCracken Fisher’s Letter to Mr. George E. Taylor” (March 5, 1945), NARA, RG 208 Entry 61, Box 1.

⑥ “Telegram from Hurley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y 3, 1945), NARA,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5-1949, Box 7262.

限度地摆脱国民政府新闻审查的束缚,这无疑有助于中国军民更加全面地获悉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事资讯。另一方面,战时情报局人员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等渠道,绕过国民党当局的邮电检查程序,向海外传递了大量有关中国战场的报道,使国际社会更充分地了解中国方面的实际情况。<sup>①</sup>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战时情报局甚至发挥了很强的外交协调作用。例如,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后,蒋介石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并计划于当年双十节宣誓就职。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希望由战时情报局局长艾尔默·戴维斯出面,邀请华莱士副总统(Henry A. Wallace)在双十节当天向全世界发表广播演说,以示庆祝和支持。9月24日,艾尔默·戴维斯在获悉此事的当天便致电华莱士,建议他答应中方请求,届时发表10—12分钟的致辞并由魏道明附带发表简短讲话。<sup>②</sup>9月28日,华莱士回电表示可能没有时间和魏道明一起参加广播节目,但愿意应邀发表致辞,并随信附上了草拟的讲话纲要,让艾尔默请熟悉中国情况的人员进行修改扩充。<sup>③</sup>在艾尔默的运筹之下,10月7日战时情报局已准备好了副总统的发言稿,相应的后续宣传报道工作也安排妥当。最终,华莱士在10月10日下午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如期发表致辞。<sup>④</sup>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苏联作为中国的主要盟国,在1943年双十节并没有像美国一样进行高规格的礼节性表示,孰料蒋介石把这件“小事”看得颇为严重,并对英、苏两国深表不满:“此次我国庆及余就职国府主席,俄国表现最冷淡,英国次之。呜呼!彼等本不以我为国家,时欲摧残毁灭之不暇,何复有庆祝礼仪之可言哉?”<sup>⑤</sup>美国战时情报局出面安排华莱士发表双十节讲话一事,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却生动地反映了该机构在战时宣传领域为维护 and 促进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所做出的努力。

## 二、宣传中国抗战的方针政策

如前文所述,根据罗斯福总统行政命令和战时情报局内部的规章制度,战时情报局拥有筛选、控制重要战争信息的权力。美国政府各宣传机关、驻外机构须根据该局制订的方针、指示,规范对内、对外宣传报道内容。因此,研究战时情报局的政策指令,对于认识和评价这一机构各项工作、尤其是宣传工作而言至关重要。由于战时情报局本土行动处在1943年就被迫撤销,海外行动处则一直运行到战争结束,所以海外行动处的各项宣传指示相对更为完整、更具研究价值。在本文中,笔者即重点选取海外行动处有关中国抗战宣传工作的指示和命令进行梳理和分析,希望借此揭示美国政府战时最高宣传机构对中国抗战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加深我们关于美国政府战时对华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海外行动处向下属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提供的“宣传指示”的主体部分是“核心指示”(Central Directive 或 General Directive),从华盛顿总部以每周一次的频率下达,通常由舍伍德处长签名落款后发出。第一份“核心指示”产生于1942年9月24日,指示正文第一段即说明“本指示的整体目

<sup>①</sup> 米蒲:《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国际宣传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9 昔年文教追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79页。

<sup>②</sup> “Office Memorandum”(September 24,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4 - 006 - 0375, p. 34.

<sup>③</sup> “Letter From H. A. Wallace to Elmer Davis”(September 28,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4 - 010 - 0563, p. 137.

<sup>④</sup> “Advance Text of Address to be Made by Vice President Wallace”, NARA, RG 208 Entry 487, Box 3100.

<sup>⑤</sup>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55),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86—87页。

标在于维系上周启动的政治宣传战”。<sup>①</sup> 10月23日之后,“核心指示”以每月四次的频率下达。从同年11月初开始,“核心指示”的格式基本固定下来,每份指示主要包括“本周任务执行情况”“相关进展”“专题宣传指示”“突出强调美国”等部分,但内容编排时而有所变化。从1943年2月下旬开始,“核心指示”的内容增加到每份10页左右,其格式也基本确定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总体指示”,通常用一段或几段话来概述近期世界政治军事形势的最新情况,传达美国政府上层的最新政策,提出最为重要的指令。针对特别重要或复杂的指示内容,在概述之后会罗列若干重要主题进行进一步阐述。第二、三部分一般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分类指示”,每一部分的指示内容按照国家、地区进行划分,关于中国的指令一般被归入“东亚”项目当中。第四部分是“近期纪念日”列表,标明在未来一周内世界范围内重要历史事件的相关信息,这些纪念日的选择并不局限于特别重大的事件,但总是与战时宣传存在紧密联系,例如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纪念日、孙中山逝世周年祭、双十节周年庆、七七事变纪念日等。此外,还经常附带一些附录资料,主要作为相关指示正文的辅助文本,提供有关专题的背景知识与信息。

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海外行动处还会分别下达“地区指示”(Regional Directive),在内容上对“核心指示”进行补充和细化,原则上受“核心指示”的约束,每周下达一次。1944年前向欧洲战区国家下达的指示远多于太平洋战区国家。随着同盟国战略东移,从1945年2月开始,“中国地区”被单列出来,每周按“中国”“世界”“美国”三大板块编排相关的宣传工作指南。此外,海外行动处还会定期下达关于宣传战、心理战的“专题指示”,其中与中国战场有关的内容所占分量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些突发的,或影响特别广泛、巨大的事件,战时情报局信息协调处(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会专门做出相应的“特别指示”(Special Guidance)。战时情报局各个战区、所有下属机构均须根据专题指示和特别指示部署情报搜集工作、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即使相关指示内容只是针对某一战区下达的,但其他部门的活动也不能与该指示的原则精神相违背。

按规定,上述各类指令是由海外行动处的计划委员会和各地区主管共同制订的。<sup>②</sup> 在实际操作中,计划委员会中的国务院代表与军方代表相比,往往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深受罗斯福总统信任的艾尔默·戴维斯的态度和意见则拥有最终裁判权。<sup>③</sup> 此外,中国地区负责人费舍尔会基于详尽的情报和现实情况、根据美国的在华利益和对华方针,在与驻华大使进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代拟相关指令条文,最后交由战时情报局总部审批。<sup>④</sup> 战时情报局在对中国抗战进行宣传时不仅是针对中国的抗日民众,而且还发挥了对敌心理战的作用,并兼顾对其他反法西斯战场进行政治宣传。这些指示始终服务于战时情报局的工作宗旨,在宣传中国抗日战争时自始至终贯穿着三大原则:鼓舞同盟国家士气、打击敌人斗志;维护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尤其是保持中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推动中国积极抗战,配合实施美国的全球战略。

战时情报局在对华宣传时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激发中国抗日军民的战斗意志,并向各国宣扬中国顽强抗战的事实,坚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斗争决心。比如,1943年5—6月,中国军队在鄂西会战中成功阻击了日军进攻,暂时解除了敌军对重庆大后方的威胁,战时情报局不失时机地对此进行大力宣传:“应动用所有广播向其他国家全方位报道近期在中国所取得的胜利。虽然不能将此胜利过分宣传为决定性的战役,但应借此展示中国人有能力坚守阵地、击退敌军。中国人所展

<sup>①</sup> Central Directive (September 24, 1942),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001-0001, p. 1.

<sup>②</sup>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4-003-0614.

<sup>③</sup> 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sup>④</sup> “F. McCracken Fisher’s Letter to Mr. George E. Taylor” (March 5, 1945), NARA, RG 208 Entry 6I, Box 1.

现的战略战术应予指出,这是重要的一个方面。”<sup>①</sup>对中国抗战的宣传并不局限于军事方面,海外行动处在同一时期的指示中这样写道:“在我们的对欧宣传中,应把中国作为一个全民抗战的杰出例子。中国已经证明,不管面临多大困难,不管敌人怎么做,依然还是可以取得进步。尽管中国几乎亡国,中国人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正在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储备着技术人力资源。”<sup>②</sup>

在中国抗战局势陷入不利状况时,战时情报局的应对也十分积极,力图起到提振抗日斗志的作用。从1944年4月开始,日军在中国河南、湖南、广西等地发起了一号作战攻势,国民党军队连连溃败、士气大挫,西方各国普遍对中国能否坚持抗战产生怀疑,战时情报局为应对这一情况,及时下达指示:“当我们的中国盟友士气消沉时,应向他们进行如下宣传:我们理解中国的困难遭遇,盟军必将把日军驱逐出中国。本周的特别日子是七月七日,即抗战爆发纪念日。……可以采纳以下观点:1. 中国是第一个遭受侵略的国家(1931年)、第一个抗击日本的国家。……2. 我们应该回顾中国的游击战……中国在过去七年的抗战构成了对抗日军的主要战略组成部分。3. 我们可以对比描述中国独力抗战之时,以及如今最强大军事力量正向其提供援助的情况。”<sup>③</sup>至该年8月底,日军打通了从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已成定局,已无多少宣传资本的战时情报局在此时巧妙地转换思路,加强对日军战略劣势地位的宣传,希望借此维护中国抗日军民的信心不致动摇。该局在9月份的指示中说:“目前日军在华南的作战应被解释为:这实际上是预料之中的防御行为。在联军通过中印公路和中国海岸全部抵达该区域之前,日军与时间进行赛跑,企图保住其陆上据点。应效法中国的方式,在评论中指出:日军的这种防御战不论赢得多少局部胜利,但对于避免败局来说为时已晚,因为就像在法国摧毁德军一样,必要时我们会利用入华通道运送足量的军队和物资来抗击日军。”<sup>④</sup>“处理日军在华作战相关问题时,应毫不犹豫地当作日军战术方面的胜利来进行报道,但我们应将其解释为满足防御需求的战役。从日本整体失利的战略地位这一更宏大的格局,来看待这些军事行动。应如此表述:日军在湖南的目标是防御其交通线以抵抗美国空军的袭击、并在陆上开辟一条‘逃亡路线’以取代中国沿岸的海上交通线”。<sup>⑤</sup>

战时情报局善于通过宣扬盟国军队的强大实力,进而起到鼓舞士气、震慑敌人的作用,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中美两国空军的宣传。1942年7月,以陈纳德为首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改编为美国第二十三航空大队,亦即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开始正式协助中国军队组建空中武装力量。战时情报局在1943年2月的指示中称:“注意不要把中美两国空军混淆。抓住一切机会强调陈纳德的团队已构筑了防御保障,中国新生的空军部队正在他们的保护下被扶持和建立起来。”<sup>⑥</sup>为了突出宣扬中国空军部队的战斗实力,战时情报局特别注意强调中国空军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甚至要

<sup>①</sup> 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 (June 8,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003-0504, p. 2.

<sup>②</sup> Overseas Operations Branch Central Directive (Week of May 7-14,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001-0187, p. 7.

<sup>③</sup> Central Directive (Week of July 4-11, 1944),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001-0812, p. 9.

<sup>④</sup> Central Directive (Week of August 29-September 5, 1944),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001-0812, p. 9.

<sup>⑤</sup> Central Directive (Week of September 12-19, 1944),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002-0001, p. 8.

<sup>⑥</sup> Overseas Operations Branch General Directive (Week of February 5-12,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001-0101, p. 6.



求宣传部门“注意应将战功完全归于中国部队,并且不要吹嘘美国的贡献。论及美国的参与作用时,应这样表达:我们现在做的仅仅是为将来开辟道路”。<sup>①</sup>同年3月驻华空军特遣队扩编之后,战时情报局又下达指示称:“陈纳德的部队从依附于印度的特遣队升格为独立的第十四航空队,应该将此作为最重要的内容加以宣传。连同报道第一批中国军事学员已于3月10日在亚利桑那州毕业,其中包括首批多引擎飞机驾驶员。借此暗示一支独立的美国轰炸部队已经建立。”<sup>②</sup>随着大批美式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运抵中国,中国战场敌我双方的空中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战时情报局进一步指示称:“应该报道中美空军与中国地面部队的联合作战,从而指出中国军队缺少空中支援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sup>③</sup>

战时情报局对华宣传的另一大准则是尽力维护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加强同盟国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与英美等国就废除在华治外法权问题展开了谈判,并于1943年1月11日正式签署新约。由于该事件极具象征意义,战时情报局将此作为这一时期重点的宣传对象。1942年10月10日蒋介石宣布英美两国决定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后,海外行动处随即下达命令,推动新闻界对此事件展开报道:“与白宫受关注程度相比,治外法权谈判尚未成为主要新闻。然而,对此谈判必须予以密切关注,并针对联合国政治和谐开展评论。这一新闻事件背后应主要暗示:英美两国采取此措施是出于他们作为民主国家与生俱来的平等和善意。他们并非是要以此购换中国的支持,而是欢迎中国加入自由平等强国的行列。”<sup>④</sup>1943年新约签订后又立即下达指示称:“尽可能多地登载和报道中美、中英签署废除治外法权条约一事及相关评论。”<sup>⑤</sup>“关注美国参议院核准我方废除治外法权条约一事。参院批准之后,随即把蒋介石作为国家塑造者进行宣扬”。<sup>⑥</sup>

1943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召开会议,讨论事宜涉及缅甸反攻、太平洋战局、亚洲殖民地处置等问题,但中国领导人却未能出席此次会谈。为了回应各界舆论的质疑,战时情报局在相关的指示中称:“在宣传北非胜利时,不仅要把它当作我们的胜利,还应要将其视为中国的胜利,进而拉近中国与同盟国之间的距离。……我们应宣传同盟国一直在与中国进行协商,从而避免给人留下中国被排除在丘吉尔—罗斯福会议之外的印象。”<sup>⑦</sup>随着中国四强地位的逐渐确立和巩固,战时情报局愈加重视强调中国与同盟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中国和其他同盟国家日益密切的合作,日本方面已显露出他们对此非常敏感,比如对莫斯科宣言、中美成立联合航空部队,日本的强烈反应就是一例事实。因此我们应继续大力宣传中国与同盟国家合作这一主题,充分利用现有素材,如:中国在同盟国家善后会议中的角色、在印度受训的中

<sup>①</sup> Overseas Operations Branch Central Directive (Week of June 4 - 11,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 - 001 - 0187, p. 3.

<sup>②</sup> 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 (March 13,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 - 003 - 0229, p. 1.

<sup>③</sup> Overseas Operations Branch Central Directive (Week of May 16 - 23, 1944),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 - 001 - 0713, p. 6.

<sup>④</sup> O. W. I. Central Directive Overseas Branch (Week of October 23 - 30, 1942),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 - 001 - 0001, pp. 7 - 8.

<sup>⑤</sup> Overseas Operations Branch General Directive (Week of January 15 - 22,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 - 001 - 0101, p. 4.

<sup>⑥</sup> Overseas Operations Branch General Directive (Week of February 5 - 12,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 - 001 - 0101, p. 6.

<sup>⑦</sup> 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 (May 17,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 - 003 - 0376, p. 2.

国部队、中国访英使团、中国已准备好在战后与其他国家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经济政治合作等等”。<sup>①</sup>又比如1943年宋美龄访美,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战时情报局不失时机地对舆论宣传进行了恰当而巧妙的引导。“特别要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同盟国家的领导角色……蒋夫人在国会的演讲、她的相关声明和总统对新闻采访的回应,应与同盟国领导人之前的主张陈述相联系,从而显示今年对日进攻的团结一致和坚定决心”。<sup>②</sup>“截至目前,我们只是报道蒋夫人访美赢得了美国的同情,这么宣传太过平淡了。我们现在可以把宣传重心转向两个同盟国家协同努力上面来”。<sup>③</sup>“我们应该继续使用更多的素材来展示中美两国的合作关系。就中国方面而言,蒋夫人送给威尔斯利学院的礼物就是一个很好的素材”。<sup>④</sup>战时情报局的舆论导向工作善于把握大局,同时又十分注重细节,体现了高超娴熟的宣传技巧和手段。

通过上述材料不难看出,战时情报局非常注重加强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但这种“友好宣传”完全是服务于美国政府的战时对华政策,当政策需要发生变化时,战时情报局也会相应调整对中国政府的正面报道,这一点在史迪威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944年中美两国关系因军事问题初现裂痕之际,战时情报局立即敏锐地做出反应并下达指令:“对于那些直接针对中国政府及其军事组织的指责,以及直接或间接批评美国在华军事力量的内容,均不予报道。疑似代表那些不重要的少数群体或极端主义者观点的相关言论,比如恶意的谣言、耸人听闻的猜测,均不予报道。”<sup>⑤</sup>美国政府宣布召回史迪威后,各国舆论大哗,战时情报局驻各同盟国分支机构纷纷表示不知如何应对。为了最大限度维护中美两国的战时同盟关系,并表达美国政府希望改善中国战场局面的基本立场,战时情报局于10月31日下达了一份内容详尽的特别指示:

美方与蒋介石委员长关于促进中国抗战的讨论已被《纽约时报》、合众社、美联社以多篇详尽的文章报道出来。我们必须快速、准确地报道这些新闻的主要内容,以维持作为通讯社的公信力。……我们可以用无线电传送同样的报道(注意以下限制),但是那些旨在把委员长描述为惹人厌的、称其为反动独裁之类的言辞,或者不信任委员长个人的、近似人身攻击的言论,应予删去。在关于此事件的诸多观点中,应优先强调能体现以下主要观点的材料:1.中美谈判的目的仅在于激励中国抗战,尤其是提升中方在对日进攻中的参与度;2.史迪威将军始终致力于此目的,为达成此目的,中国军事当局应给予史迪威将军的继任者远多于史迪威将军所曾得到的支持与权力;3.对于那些在重庆的反动分子,美国人民认为他们不是中国人民最大利益的代表,而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则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强烈同情心和友情。……明确地将行政与军事方面低效无能的整体状况,归咎于委员长身边的反动官僚们。<sup>⑥</sup>

<sup>①</sup> Overseas Operations Branch Central Directive (Week of November 19 - 26,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 - 001 - 0396, p. 3.

<sup>②</sup> 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 (February 20,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 - 003 - 0159, p. 2.

<sup>③</sup> 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 (March 27,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 - 003 - 0229, p. 2.

<sup>④</sup> Overseas Operations Branch Central Directive (Week of October 28 - November 3,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 - 001 - 0396, p. 6.

<sup>⑤</sup> Central Directive (Week of September 26 - October 3, 1944),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 - 002 - 0001, p. 9.

<sup>⑥</sup> “Special Guidance of Treatment of American News and Comment Concerning The Recall of General Stilwell and the Military Situation in China” (October 31, 1944),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 - 011 - 0001, pp. 1 - 2.

整体来看,战时情报局针对史迪威事件所制订的宣传指南表现出以大局为重的克制态度,但同时也对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批评,这在该局战时对华宣传中是较为罕见的。应当指出,战时情报局在宣传上不遗余力巩固两国建立起来的战时同盟,其根本目的在于促使中国最大程度发挥牵制、打击日本战略作用,当中国未能按照美国政府的意愿履行“盟友义务”时,该机构也不会盲目袒护国民政府。

总体来说,战时情报局在进行宣传活动时基本上保持了客观、务实的态度,并非一味地制造声势、贪图一时的宣传效果。比如1943年中国部队在鄂西战役中击退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战时情报局对时局有着客观冷静的判断和分析:“有一点要强调,日本的威胁只是被遏制了,而并未被彻底消除。日军仍控制着发起进攻前的重要据点,并掌握着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此外,他们的炮兵拥有优势力量。因而不能指望中国人向这些敌人固守的阵地纵深发起反攻。”<sup>①</sup>在同年12月,该局收到日军在华作战使用毒气的消息时,并未因为该消息有利于揭露日军暴行而立即予以报道,而是下达指令要求客观处理此事:“近期在洞庭湖区域作战的日军似乎使用了催泪瓦斯,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使用了毒气。除非联合公报上出现相关报道,我们完全不应提及日军使用毒气一事。”<sup>②</sup>此外,战时情报局还特别注意对相关军事情报采取保密措施,比如美军在华建立空军基地并成功袭击日本本土时,该局就注意在宣传战果的同时不应透露轰炸机基地位于中国,以免招致日军的袭击。<sup>③</sup>

### 三、战时情报局对中共的态度

战时情报局在进行对华宣传时,极少涉及中国内政问题,在处理和报道中国内部矛盾和国共关系方面表现出较为谨慎的态度。然而,在搜集与中共抗战相关情报信息方面,该机构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

基于维护中国政府“统一”形象的考虑,战时情报局在成立后的头两年,很少对中共在抗战中的贡献进行集中宣传。尤其是在对“游击战”的报道方面,战时情报局认为不应该为了宣传游击战场的成就而造成中国军队之间的矛盾:“在报道中国军事事件时,我们应该特地将新闻受众的注意力引向游击战本身,并凸显它们与正面战场之间的联系。……注意:大多数新闻报道孤立游击行动,并且未展现游击战区与正规军战场之间的联系。由于中国正规军中许多将领嫉妒游击队及其在海外所受到的关注,我们绝不应该只是提及游击队的功绩,而应保持将其与某一正规军的重要前线相关联。日本人将游击队伍等同于共产党,我们应回避这种提法。”<sup>④</sup>比如,日军在1943年进攻宜昌失败后,太行山区的游击部队借机向敌后日军频繁发起骚扰,战时情报局立即下达指令“注意(宣传)黄河湾区正规军前线与太行山区游击战线之间的关系。”<sup>⑤</sup>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避免过多宣

<sup>①</sup> 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 (June 14,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003-0504, p. 1.

<sup>②</sup> Overseas Operations Branch Central Directive (Week December 16-23,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001-0396, p. 7.

<sup>③</sup> Overseas Operations Branch Central Directive (Week May 14-21,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001-0187, p. 4.

<sup>④</sup> Overseas Operations Branch General Directive (Week April 9-16,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001-0187, p. 4.

<sup>⑤</sup> 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 (July 17,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003-0608, p. 2.

扬共产党抗战而刺激国民党军队。有意思的是,战时情报局对中共的游击战术其实是深表认可的,并认为应当在中国以外的战区进行大力宣传:“在直接发往中国的汉语报道中,不必扩大对游击战的宣传,但可用其他语言进行报道,让其他国家学习中国的游击战术。”<sup>①</sup>对于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战时情报局总的宣传原则是:“赞扬中国游击队伍的机动性和持久性,展示出是游击队的机动性和正规军的韧性共同抵御了日军,这样宣传是合理的。这是对日本向游击队、正规军进行政治挑拨的反制措施。”<sup>②</sup>然而,这样的宣传方针显然是偏袒国民党政府的,太平洋战区主任拉铁摩尔对此也承认:“在对中国的播音中,我们强调全体中国人在他们的英雄领袖蒋介石的领导下团结抗战,而不对统一战线作实际的政治宣传。不过,我们所讲的一切都间接地支持统一战线的思想,只是不单独提到中共。如果共产党在中国某地对日本人进行了一场成功的游击战,我们只说‘游击队’而不讲‘共产党游击队’。”<sup>③</sup>

战时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并不仅限于游击战,在1944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考察之前,该局对于中共政治、军事方面的基本态度是:1. 中共军队在华北拖住了大量日军,主要运用游击战骚扰敌军、破坏日军交通线。2. 对西北地区的封锁削弱了中共的军事、经济实力,是限制其对日作战的重要原因。3. 中共动员群众参与到抗日战争中,在获取敌军情报、掩护和救助抗日部队方面获得很大成效。4. 中共是中国的第二大党派,但在重庆政府内并不发挥行政作用。5. 中共在表面上尊重和维持抗日统一战线和蒋介石政府的领导,抗日战争结束前不会发生大规模内战,但国共双方存在分歧和矛盾。<sup>④</sup>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民党对各根据地的封锁、加之外部环境的约束,美国战时情报局获取有关中共方面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主要通过《新华日报》等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报刊、驻华大使馆、在根据地旅行的游客和传教士等,包括费舍尔在内的许多情报局官员,他们对中共抗战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红星照耀中国》《中国的双星》等英文著作的影响。<sup>⑤</sup>中共军队的军事实力和作战情况如何?为何游击战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存在?中共对国民党政府和同盟国家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对于这些问题,战时情报局迫切地希望得到答案。<sup>⑥</sup>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3—1944年间先后制订了“马特洪恩计划”和“中国沿海登陆作战计划”,为了实现对日反攻、轰炸日本本土,美国军方亟须中共在游击作战、日军情报、气象信息等多方面提供支持与合作。<sup>⑦</sup>

在罗斯福的支持下,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和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E. Gauss)多次要求国民政府开放对中共边区的信息封锁。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1944年2月下旬,蒋介石同意中外记者赴延安进行考察,“中外记者西北视察团”于5月17日从重庆启程,其中包括爱泼斯坦(Israel

① 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 (April 17,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 - 003 - 0307, p. 2.

② 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 (February 20, 194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 - 003 - 0229, p. 2.

③ 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161页。

④ “The Current Military and Economic Effectiven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June 26, 1943),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9. “The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Forces in Fighting Japanese Troops in China during the Fifth Year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July 12, 1943),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85. “Guerrilla Warfare in China” (January 19, 1944),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85. “Report on Observation in China by Richard Watts Jr.” (March 23, 1944), NARA, RG 208 Entry 487, Box 3100.

⑤ “Military Attaché’s Report No. 808” (April 26, 1944), NARA, RG 208 Entry 61, Box 1.

⑥ “Examination of the Chungking China Press” (June 21, 1943),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8.

⑦ 斯蒂文·L·瑞尔登著,许秀芬、王淑玲、林晓颖译:《谁掌控美国的战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史(1942—1991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29—60页。

Eptein)、武道(Maurice Votaw)等六名外国记者和九名中国记者以及四名国民政府官员。<sup>①</sup>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进行了长期的负面宣传,战时情报局还曾一度担心赴延安记者团会沦为重庆的宣传工具:“计划中的外国记者赴延安之行将可能导致国共关系比以往更为微妙,并且可能会释放出大量经过官方授意的关于共产党罪行的消息。我们在报道国民党或记者团两方面的消息时,都应十分小心,并且不要强调这次访问。”<sup>②</sup>而实际上,这批记者基本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在美国方面人士尚未返回前,中国记者先行于当年7月返回重庆,带回了《解放日报》等大量延安当地的报刊资料。战时情报局情报员、《纽约邮报》驻重庆记者理查德·沃茨(Richard Watts)在第一时间内对这批资料进行了翻译,并发送到战时情报局华盛顿总部,内容主要包括沦陷区日军“大扫荡”的统计数据、中共游击部队的活动、日军方面的情报等。<sup>③</sup>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地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精神,与国统区消沉、腐败的社会氛围形成鲜明对比,这给沃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发给战时情报局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他的听闻和感受。<sup>④</sup>

7月22日,由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校领衔的美军观察组和史迪威的顾问谢伟思(John S. Service)、卢登(Raymond P. Ludden)一行抵达延安,对中共的各方面情况展开了细致的考察。其间,在延安的日本战俘引起了观察组的注意。由于战时情报局非常缺乏日文情报员,为了进一步挖掘这方面的信息,精通日语的美国国务院外交官埃默森(John K. Emmerson)和军事情报局情报员有吉幸治于该年10月被同时派往延安,对大约150名日本战俘进行了调查和访谈,并根据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等人提供的线索,编写了大量针对日军的劝降书等各类心理战传单。<sup>⑤</sup>同时,战时情报局还把在缅甸、昆明、夏威夷等地印发的日文传单和对日广播材料交给延安“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请日籍情报员亲自审核其内容,并在对日心理战方面提出建议和批评,进而改善对日宣传工作。<sup>⑥</sup>此外,有吉幸治等人还对韩国独立联盟、日本工农学校、日本战俘的思想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和总结汇报,为战时情报局提供了丰富的政治宣传资料。<sup>⑦</sup>

然而,从延安发出的大量珍贵信息却未能被战时情报局加以充分利用。出于种种考虑,战时情报局多次明确规定:“一律禁止报道延安方面反军国主义日人所做的有关日本和日本领导人的报告。”<sup>⑧</sup>“延安电台发来有关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合适素材时,应审核汇报是否与本局有关指示相一致。报道只能标注发自‘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而不能是延安电台”。<sup>⑨</sup>在1944年11月战时情报

① 山极晃著,鹿锡俊译:《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展开1941—197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② Central Directive (Week of April 25 - May 1, 1944),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001-0598, p. 6.

③ “Statistics on Jap ‘Mopping-up’ Campaigns in ‘Occupied’ China” (June 6, 1944); “Report on Activities of Communist Guerilla Armies in China” (June 10, 1944);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Railway Construction Plan” (July 5, 1944),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6.

④ “Informal Report on Various Matters Dealing with Current China by Richard Watts Jr.” (August 15, 1944), NARA, RG 208 Entry 61, Box 1.

⑤ 凌青:《从延安到联合国——凌青外交生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4页。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161页。

⑥ “Yenan Report 57”, “Yenan Report 64”, “Yenan Report 65”, “Yenan Report 69”,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⑦ “Yenan Report 26”, “Yenan Report 50”, “Yenan Report 58”, NARA,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山极晃[米戰時情報局の延安報告と日本人民解放連盟]、付録資料。

⑧ Central Directive (Week of October 10 - 17, 1944),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002-0001, p. 7.

⑨ Central Directive (Week of November 14 - 21, 1944),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002-0139, p. 4.

局下发的《对待中共特别指示》中,我们可以管窥该局之所以做出上述指令的主要原因:

我们处理有关中共方面新闻时的宣传目的,在于指出中共如何使用高效手段动员民众参与抗战,而这种方式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得以实践。我们要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美国人民并不支持中国的共产主义,而是支持随处可见的有成效的群众武装。……在外交方面我们必须牢记,重庆政府是我国所承认的联合政府,“美国之音”似乎不应从延安电台这样不受重庆方面审查的来源获取消息。我们还应牢记,我们对中国所提出的进行改革的善意希望,可能在非共产主义中国更能起到作用,美国民众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理念而非延安方面的广播而提出了这些具有同情心的建议,而延安广播则可能会被贴上共产党政治宣传的标签并遭受贬损。<sup>①</sup>

对于发自延安的情报消息,战时情报局始终加以严格管控,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但更多地是为了避免华盛顿与重庆发生冲突,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然而尽管如此,战时情报局在1944年之后不断从延安获取情报、向外界透露消息的做法还是招致国民政府的忌恨。1944年10月28日晚,蒋介石在主持军事汇报时,对一年来“共匪利用美国舆论以诬蔑我国家及余之本人信誉”表示异常愤慨,并将其与史迪威事件相联系,认为此系美国“挟共匪以谋我”。<sup>②</sup>当年12月23日,王世杰在重庆约谈费舍尔,“剖切表示彼此必须密切合作”,表面上是“讨论如何从事于对敌宣传工作”,而实际上他最为关心的问题并不在此。王世杰在当天日记中记道:“近一年来,该处人员常常与中共人员联络,且多传达美国不利于我政府之文字,予意欲逐渐纠正之。”<sup>③</sup>在之后几个月内,王世杰和董显光对“美国之音”等公开批评国民党向战时情报局接连提出抗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方面产生了较大分歧。以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应贯彻罗斯福的外交方针,一切以维持国民党政权的权威、加强与国民政府的合作为中心,在雅尔塔协定的框架内通过改善中、美、苏大国关系,继而保障美国在远东的最大利益。而以约翰·戴维斯(John P. Davies Jr.)、谢伟思为代表的职业外交官一派则认为,中共并不依附于任何外国势力,并且拥有夺取全国政权的强大潜力,美国政府应该对国共两党采取平衡的外交战略,而不能过分依赖腐败独裁的国民政府。<sup>④</sup>同样,关于对中共采取何种态度,战时情报局内部也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虽然该局高层已决定服从白宫的意见、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但在情报局基层部门中,有很多人本着反法西斯主义的原则和“实现美国理想”的情怀,认为不能屈从于国民政府的压力,应该客观地报道中国抗战的情况。<sup>⑤</sup>战时情报局中下层人员的这种意见或许能对该机构宣传指令的实施构成一些阻碍和抵制,但终究无法扭转抗战结束前夕美国对华宣传的整体方针。

<sup>①</sup> “Special Guidance on Treat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November 3, 1944),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011-0001, p. 1.

<sup>②</sup> 叶惠芬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58),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732—733页。

<sup>③</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4册,第474页。

<sup>④</sup> 邹浣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187页。Barbara E. Gooden Mulch, *A Chinese Puzzle: Patrick J. Hurley And The Foreign Service Officer Controversy*,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2.

<sup>⑤</sup> “TK from Fisher (SF) to Taylor, Fairbank, Caldwell”, “Memo from Eddy David to Phil Lilienthal and John Foster”, NARA, RG 208 Entry 6I, Box 1.

## 余 论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换取苏联出兵远东的承诺。5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出台了直接从太平洋方向进攻日本本土的“奥林匹克”计划(Operation Olympic)和“小王冠”计划(Operation Coronet)<sup>①</sup>,实际上已基本放弃了在中国大规模登陆的作战计划。对于美国来说,中共在远东战场的军事战略地位随之降低,而此时美国更需要一个“统一强大”的亲美政权来兑现它在雅尔塔密约中向苏联所做出的许诺,保障美国在战后亚太地区的长期利益。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倾向于加强同国民党政府的合作,并不断向中共施加压力。战时情报局紧随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更加严格地限制来源于中共的报道。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初期,该局更是明确地下达指示:“延安方面或代表中共官方立场的消息如果是出现在美国媒体上,方则可以使用,消息应标明来源于美国。使用此类材料时,必须限制于报道事件梗概、计划或政策声明,所有指责、批评的内容必须加以剔除,并且不准引用原话。”<sup>②</sup>战时情报局在战争结束之时如此严密地封锁中共方面的消息,真实地折射出美国政府在国共两党问题上所做出的政治选择。按照战时情报局的制度设计,该机构隶属于白宫应急管理办公室,宣传口径须与美国政府,尤其是与美国总统的意志保持一致。<sup>③</sup>应当说,战时情报局作为美国最高行政机构下属的对外宣传权威部门,曾经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它又是直接服务于美国外交战略的工具,注定无法摆脱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约束和限制。

抗战胜利后,战时情报局很快便改组为国务院国际新闻与文化事务局,其驻外机构统称美国新闻处,隶属于美国驻各地使领馆。战时情报局驻华机构从事宣传战、心理战、情报战的职能也逐渐转向全方位对华宣传、积极开展文化渗透等方面。美国新闻处继承了战时情报局抗战时期在中国积累的大量资源,这为战后美国进一步对华输出意识形态、传播西方文化、加强政治宣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使之继续成为实现美国在远东地区战略利益的重要工具。

[作者贾钦涵,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Proposed Issue of OLYMPIC Directive” (April 30, 1945), “Directive For Operation OLYMPIC” (May 25, 1945), 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Microfilm), Part I: 1942 - 1945, The Pacific Theater, NARA, Reel 9.

② Central Directive (Week of August 15 - 22, 1945), quoted in Korea Regional Directive (August 24, 1945),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oQuest History Vault, No. 003446 - 009 - 0271, p. 1.

③ “Text of a memorandum to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from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 Director General William Donovan” (June 19, 1944),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No. 308031.

control, public opinion control and village control, and built a set of social control systems that covered inside and outside and stretched across towns and villages. However, the Xinmin Society's control to Tong county was not successful. Even the effects in Tong county, as a model county of the Japanese and puppet authorities, was not obvious, the effects of the puppet government's control to grass-root society in whole occupied areas in North China should not be overvalued.

**Difficult Evolu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Army's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Stage of Strategic Stalemat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9 –1944** ..... *Chen Mo* (77)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and the USA's Policies toward China, 1942 –1945**

..... *Jia Qinhan* (93)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US government's control to public opinions, President Roosevelt established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in June 1942 to take anti-Fascism propaganda, psychological warfare to enemy 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n all over the world. Until August 1945 President Truman dissolved the Office, in more than three years it presented many reports about China's resistance, making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fighting spirit, to the inspiration of fight hearts of Chinese military and common people, and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wartime relations between allied countries. The propaganda lines of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to China's resistance, in particular the Office's attitude to the CCP and its armed forces directly indicated the trend of the US government's policies toward China, and revealed the substance of the USA's Far East strategy.

**Same Names, Different Substance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unty Magistrates of the Guomindang and the CCP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Yang Dong* (108)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ough the county magistrates of the CCP and the Guomindang form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ir grass-root political power had almost historical positions, and carried great expectations of both parties, they had man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design ideas of county administrations, the two groups formed different social class frameworks; and because of different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systems, the age structures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greatly different. Looking from implementation systems of county administrations, the two groups had different working ways and styles, and the effects of administrations were quite different. The historical facets with same names but different substances and the spirit worlds with very different interests were to a great degree formed their different life tracks and life styles, and formed different political cultures, refracting the different ideological signs and symbols of the Guomindang and the CCP.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 –1895,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and Changes of the Sino-Foreign Treaty Relations** ..... *Li Yumin* (127)

**How to Understand Modern Japanese People's China Views** ..... *Zhuge Weidong* (148)

**New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on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A Summary of The Second Young Scholars' Conference on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Pan Xun, Zhao Guozhuang, Lü Shujie* (152)

**A Summ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he North China in the 1930s and 1940s"** ..... *Xu Xinge* (156)